

根治“群众感情缺失症”

□ 张书林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在不断的交往联系中培养起来的，如果相互之间不联系、不熟悉，感情就无从谈起。

入手，进一步明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下大力气去集中解决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自觉对照自己固有的群众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进一步增强群众意识、强化群众观念、坚持执政为民、发展改善民生，自觉做到“把群众当父母、当亲人，把群众的事当家事，把党群关系当亲戚关系”，不断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维护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要自觉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念。群众感情的前提是群众观念，没有正确的群众观念，就谈不上真正的群众感情。因此，增强党的群众感情，就要首先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念。群众观念是群众工作中沉淀形成的经验在观念层面上的反映。从着力增强群众感情的基点出发，当前应自觉树立以下群众观念：以人与本与执政为民的观念、向群众学习与教育引导群众前进相统一的观念、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相统一的观念、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念、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人与人之间

的感情是在不断的交往联系中培养起来的，如果相互之间不联系、不熟悉，感情就无从谈起。党与群众的感情也是这样。因此，增强党的群众感情就要从密切党群关系入手。要深入贯彻中央政治局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在联系群众上出实招、讲实效。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切实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只有参透了群众的向往与追求，才能做出真正让群众满意的事来。要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做到“短平快”，克服联系群众过程中出现的“西瓜大的壳、芝麻大的核”以及“嘴尖皮厚腹中空”等不到位现象。

要学会运用群众性语言。感情是要靠联系沟通建构起来的，最便捷的联系沟通工具就是语言交流。因此，增强群众感情就要学会与群众沟通交流。要保证与群众沟通交流的顺畅、达意、准确，就必须学会运用群众语言、讲群众听得懂的话。现在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与新社会阶层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年轻人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主要的原因在于不会运用群众性的语言、不

熟悉群众的话语系统。党的话语系统、政策性话语系统与群众性话语系统、民间话语系统是有区别的。领导干部要做好群众工作，要拉近与群众的感情，就应该及时进行话语系统的转换，学会运用群众性话语系统。为此，就要做到：第一，对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要理解透彻、熟稔于心，进而做到熟能生巧，在党的话语系统与群众话语系统间自由穿梭；第二，多到群众中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力求直接联系群众，多注意聆听与观察群众的语言表达方式及习惯；第三，放下官架子，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自觉融入到群众的情感世界中去。

要杜绝与民争利。感情最容易被利益所腐蚀，尤其是私利。领导干部在涉及到纠缠不清的利益分割时，必须注意维护群众利益、学会吃亏。要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公仆意识，懂得去算政治账，而不是一味地去算经济账；懂得去算维护人民利益和福祉的“大账”，而不是去算个人的“小账”，一味地去计较个人得失。党的干部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吃亏问题，经常纠结纠缠于自己到底是吃亏了还是没有吃亏的患得患失之中，时时刻刻都在计较个人的“投入”与“产出”，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与民争利的境况中。如此，就会伤害到党群、干群之间的感情。

血脉根基

“秒转作风”不可取

□ 邵惠滨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转变作风是要义。但是如下这种“转变”，却万万要不得：某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二楼办事大厅内，13个服务窗口在领导检查到来的半分钟内全部开放，而此时只有4个窗口在办理业务。此种行为被戏称为“秒转作风”。

“秒转作风”事件无疑给人一记当头棒喝。这种现象绝不是个例，在很多地方的基层工作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它以小见大反映出政府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形式主义。一句“领导来了”顿时让所有服务窗口全部开放，所有排队市民在几分钟之内办完业务，前后反差极大，尤其是某位工作人员偷偷说道：“没号了，怎么办？”颇具喜剧效果，这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表现。走群众路线必须坚决反对人浮于事，反对形式主义，要为民说实话、办实事。二是脱离群众。领导没来，话难听，脸难看，事难办；领导来了，好话连篇，笑容满面，服务周到。这只是对上、不对下，与领导亲、与群众远，脱离群众的表现。走群众路线必须坚决反对亲领导、远群众的行为，剔除官本位思想，切实做到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三是服务意识欠缺。为什么前后出现了不同的工作作风？追本溯源就在于服务意识的欠缺。政府工作人员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而是热情服务的人民公仆。走群众路线必须端正态度，放下“官架子”，蹲下“身架子”，走下“神坛子”，牢牢把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但绝不是“秒改作风”。改进作风不应是“欺上瞒下”式地表现给领导看，而应是服务群众、以群众利益为重的务实之举，并由群众来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因此，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彻底杜绝“秒转作风”之类的现象，通过完善监督、评议、惩处制度和建立长效机制来保证活动不变质、有实效，使广大群众真正从中收益，切实感受到新风新貌。

一要加强监督。“秒改作风”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监管的缺位，对此可以实行“群众”和“领导”的双重监督，不妨向银行等企业学习，设立群众满意投票箱，同时利用好监控探头，让群众和领导共同监督工作人员的行为。二要完善评议、惩处制度。建立群众满意度评价体系，与绩效考核体系相挂钩，使群众的满意度评价直接影响到工作人员的考评成绩，通过奖优惩劣制度来倒逼工作人员改进作风，并逐步探索形成长效机制。三是深入开展“服务型政府”建设。通过一些列思想教育活动，加强服务群众的意识和主动性积极性，将其贯彻到政府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中；同时通过开展“公共服务培训”，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和质量。

□ 危永安

理论联系实际 如何“联”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提升理论联系实际水平，应以问题为中心自觉做到“三个强化”。强化理论学习，夯实“联”的前提。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理论联系实际而言，“器”就是科学理论，“利其器”就是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当前，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面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新考验，面对艰巨繁重任务赋予的新责任，我们只有学好科学理论，尤其是学好用好党的创新理论，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具备坚实基础。学习党的创新理论首先应注重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的结合，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世界观、方法论，做到抓住实质，全面正确把握，真正坚信不移；其次要摒弃经验主义倾向，防止和克服“差不多”“无所谓”思想，不断提高学习效率，增强学习效果，把党的创新理论作为理想信念来坚守，作为思想武器来掌握；再次要科学安排理论学习，发扬“挤”和“钻”的钉子精神，把理论学深、学透，要带着问题学，以提高学习效率。

强化调查研究，夯实“联”的基础。理论联系实际要吃透两头，一头是科学理论，一头是客观实际，二者不可偏废。要吃透实际，就不能离开调查研究。尽管现在调查研究的内容、手段、条件等发生了变化，但其作用地位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为重要。要搞好调查研究，一要遵循党的创新路线和群众路线，切实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心系群众、身入群众；二要把握调查研究的各项原则，主要是客观性原则、科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三要采用恰当的方式方法收集资料，比如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等，并根据调查的具体情况，选用典型调查、重点调查、抽样调查、个案调查等方式，在搜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去粗取精，并进行综合分析，取得符合实际的研究成果；四要畅通联系群众的渠道，使调查研究成果更加全面客观，符合人民群众的诉求；五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调查研究的效率，调研中要围绕问题开展，有的放矢。

强化全面联系，夯实“联”的内容。一要既联系全局，又联系局部。联系全局的实际，就是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实际，联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实际，联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联系局部的实际，就是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真深入地研究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乃至每个人、每件事的情况，把问题找出来，把家底搞清楚，就要求求真务实、心中有数。二要既联系国内，又联系国际。这就要求我们树立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三要既联系现实，又联系历史。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是一个过程，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善于联系历史，才有助于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犯错误。

(作者系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

思想解剖刀

超越“在商言商”

□ 马清伟

源起

近日，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在商言商”，随后引起大讨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不少。

从政商之间保持合理距离的角度看，“在商言商”有其积极意义。但“不作恶”只是一种底线原则，企业家还应追求向上超越，通过关注公共事务来推动整体社会环境的改善。

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言论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理解和讨论，说明在当下现实环境中，确实存在一些令企业家无法专心“营商”的因素。

“在商言商”这一选择有没有合理性？有，而且是目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颇具合理性的选择。我们现在经常讲“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就是因为过往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模糊不清，很多企业家欲求“在商言商”而不可得。如此我们才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好发挥市场和企业的作用，通过政府的简政放权等“自我革命”措施，为企业家营造一个更为独立宽松的营商环境，使他们能够不必整天应付各种检查或其他本不该由企业来承担的事务，心无旁骛地开展经营活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效益和财富。

另一方面，就反腐败来说，倡导“在商言商”同样有其积极意义和作用。社会的不同领域之间理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在商就应该言商，在政就应该言政，如果两者建立起了不健康的联系和结合，就很可能造成腐败。不管是政府和官员不合理地干涉企业事务，或者非法侵害企业的利益、收受企业的贿赂，还是企业主动贿赂、勾结部分不法官员，牟取非法利益，双方之间的不合理的“跨界”都是一种扰乱正常经济秩序、败坏良好社会风气的行为，也是当前腐败的主要形式。因此，政商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君子之交淡如水，相敬如宾而不是勾肩搭背，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但“在商言商”归根结底只是作为企业家的一种行事底线，现实环境固然使得很多企业家选择不越过底线已经很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掌握了更多资源和拥有较高名望的企业家，其选择停留在底线上而不上去探索超越的可能就是合理的——虽然这并不是他们的义务。

就像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工作一样，营商是企业家的本职工作，强调“在商言商”，追求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这无可厚非。尤其是企业家的工作相比普通人来说，

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他们同样从中获得了远比普通人为多的利润回报，因此这并不能成为一些人所认为的，企业家通过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已经产生了足够的社会效益，故可以不参与社会事务的理由。

制度环境和社会治理的改善，每个人都是受益者；但在推动其改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风险。如果每个人都只满足于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置之不理，抱着“搭便车”的心态，指望别人啃硬骨头、涉险滩，自己坐享其成，那么“改善”最终必将沦为空谈。拥有强大号召力和广泛影响力的企业家，如果只顾自己闷声发大财，并把“在商言商”“莫谈国事”挂在嘴



谈“做人”

□ 田建国

么逻辑关系？有五句可以简要概括：没有品行光有动机很危险，没有动机光有潜能是无能，没有潜能光有理解力是有限的，没有理解力光有知识毫无意义，没有知识光有经验则变得非常盲目。

世界一流大学高度重视做人要求。闻名世界的斯坦福大学，前两年不分专业，不管你兴趣在哪里，都必须选修一门为期一年的课程“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在这门课上，不仅学习西方传统经典(柏拉图、笛卡尔、马克思等)，而且接触世界其他文化的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例如中国的孔孟之道)。课程围绕“人何以为人”这一主题展开，无论学生将来选择什么专业，都必须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斯坦福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学生懂得“做人第一，修业第二”。

古今中外优秀人才成长表明：做人是魂，做事是根。树魂必立根，立根须树魂。魂之不存，根将焉附？做事离不开做人，做人离不开做事，做人直接影响做事态度。人的潜能，只有在做事中才能开发；人的能力，只有在做事中才能发挥；人的成就只有在做事中才能取得；人的梦想，只有在做事中才能实现。做事就是做人，做人就是做事。有位著名企业家讲，人都做不了，还做什么事，只能做坏事，只能害人。有位艺术家也讲过，三分演戏，七分做人。做人是主导，做事是基础；没有做人，做事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

学会做人，首先要认识到应以德行为先。一个人做人做事都是相通的，但做人为本。只有首先学会做人，才能做好事。做事应当精明一些，做人应当糊涂一些；做事总会有得失成

败，做人要经得起实践考验。学会做人是立身之本，学习知识掌握技能只是服务社会的手段。前者的学习是根本性的，后者的学习是工具性的，如果我们重智轻德，忽视人的思想品德塑造，必然导致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按照片面发展理念培养出来的人，必然是有智商，没智慧；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化，没修养；有欲望，没理想；有目标，没信仰——这将是十分危险的。

做人理念缺失必然导致功利主义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的主导倾向是：重视现实，轻视理想；热衷功利，漠视义理；珍视个人，忽视社会；关注物质，鄙视精神；趋附感性，拒斥理性。开国元勋陈毅元帅曾讲过，空军飞行员飞行技术不好不行，但飞行技术很好，一飞就飞到敌人那里去了，打自己国家更不行。才高而缺德是灾难。

要成才先成人，不成人宁无才。有德无才有误事，有才无德要坏事。成小事靠业务本领，成大事靠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道德人格、思想品德比专业技能学习、谋生手段训练、竞争能力培养更重要。做人成功，不成功是暂时的；做人不成功，成功也是暂时的。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可以做好任何事情，但一个工具化的人只能机械完成一件事。

学会做人，还要懂得做人的道理。做人道理是一门学问，有许多经典，有许多实例，有许多楷模，有一套循序渐进的做人标准。第一步，做好人和善人，不要做坏人和恶人。第二步，做君子，不做小人，就是做有学问有道德的人。第三步，做志士仁人。志向远大、胸怀天下、任重道远、意志坚

边，那么普通人就更有理由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企业家能够坚守自己的底线和良知，“在商言商”，不搞政商勾结、权钱交易那一套，这固然令人感到敬佩；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作恶”只是为人处世的底线原则，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而应该追求向上超越，在关心个人私利的同时也关心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以积极的态度和作为促进社会环境的改善。同时，整体环境的改善也内在包涵着企业营商环境的改善，因此企业家群体同样是自身关心公共事务、推动环境改善的最终和长期受益者。从这一角度看，“在商言商”自有其超越意义，重要的是我们是从狭隘和庸俗的视角，还是从广义和长远的视角去理解它。

(作者系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